

绪 论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15 世纪以前，在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进入 16 世纪以后，当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向东方实行殖民扩张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比如农耕工具、天体观察、人体解剖和火炮铸造等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了。当时国防尖端技术主要是造船、航海、冶铁、火药，这几项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这时候也开始落后了。

清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开始由先进变为落后的时候。这是清入关后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国和西方列强虽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落后还不算太远。是否认识到这种挑战，以及能否成功地因应这种挑战，关联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是一如既往，保持领先地位，屹立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还是停滞落后，沦落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不同的结局虽在一两百年以后才见分晓，但命运的挑战却在清兵入关之时。

人操舟而我结筏

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程之远，复航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海上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强国所能相比。但明成祖派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所以明成祖一死，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被视为“弊政”。自郑和以后，不再建造远洋巨舶，连下西洋的档案也被隐匿、销毁了。从此，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停滞甚至倒退了。

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对付东南海疆的敌人，采取了禁海政策，严峻时甚至“无许片帆入海”。这种禁海政策延续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列强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开扩新市场，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航海热又刺激天文、数学、力学、历法、地理测绘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各项科学发明，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奖励。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两代朝野上下均无海权观念。政府严厉限制民间海外通商，不许建造大型海船，禁止远洋航行，扼杀了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康熙年间的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者千余艘，这本是振兴中国造船业的一线希望。就因为其中半数卖与外国，以为这会危及大清江山而感到犹豫和恐慌，终于下令禁止。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万里海疆实际上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

大约在雍乾之际，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又推动了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各主要工业部门纷纷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使工业生产如虎添翼。到 19 世纪 40 年代，蒸汽机已取代其他动力。用蒸汽机驱动的机床相继发明，开始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阶段。

1785 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至 1796 年（嘉庆元年）已有大约 300 台蒸汽机应用于工业，到 1825 年（道光五年）就增加至 1.5 万台。蒸汽机除用于工业外，同时也用于航运革新。1790 年已有载客的轮船。1821 年一艘 400 余吨的轮船首次横渡大西洋成功。至 1830 年（道光十年），汽船达 300 艘，约 3 万吨。1830 年斯蒂芬逊所发明的火车正式用于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钢铁和煤炭工业也飞速发展。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铁产量为 2 万吨。1806 年（嘉庆十一年）增加到 25 万吨。到 1850 年（道光三十年）每年可产 250 万吨。煤产量在 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为 1 600 万吨，到 1856 年（咸丰六年）跃增为 6 500 万吨。

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这时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诩，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但当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中国正在大兴文字狱。以荒诞的推理，判定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字有罪，而处以重刑并罪及亲友，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取证又是捕风捉影，以至人人自危，避祸惟恐不及。读书人的智慧和才华，

被禁锢在小而又小的牢笼里。在这种极端沉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能理智地去思考问题，不敢就任何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谈吐著述，远离现实，或潜心于考据，或诚惶诚恐地做些颂扬君上圣哲的文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思想控制之严，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正当中国厉行思想控制的时候，西方各国一大批划时代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官僚队伍，是由那些背诵儒家经典和擅长八股文、试帖诗的人组成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狭隘的精神生活，畸形的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康雍乾三朝，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这个盛世，如作纵向比较，比以往任何一个盛世都毫不逊色，但作横向比较，已经落后西方很远了。这时西欧、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发展，并以同样的速度建立强大的武装，加速海外殖民扩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国落后了，而且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落后了。左宗棠说过“人操舟而我结筏”的话，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发展

速度也很适宜。两种不同的发展速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将长期落后于西方，并陷入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鸦片输入中国，由来已久，最初只当药用，输入数量不大，清初大约每年 200 箱。从雍正开始查禁，但禁而不止。后来英国商人把大量鸦片通过走私输入中国，吸食的风气日盛。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进口竟达 4 万箱。鸦片大量进口，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猛涨。它不只是耗尽个人的精力和财力，且如林则徐所说：“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不但亡家，实可亡国”的可怕后果，促使道光皇帝决心从严查禁。

清政府决心从严查禁时，国势已日益衰弱。禁烟只是根据国内情况作出的决策，对禁烟可能引起的英国的反应，并未作出充分的估量，更未在外交、外贸、国防上周密地筹划对策。既不知己，尤不知彼。这种情况使清政府在新的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处于毫无应付能力的地位。清政府也缺乏坚定不移的对策，忽“抚”忽战，摇摆不定。既要征调军队开赴前线，又担心军费开支超越了国库承受能力。既不甘心丧权辱国，表示要决一死战，又怕外战引发了内乱，不敢奋战到底。小胜便骄傲，稍一受挫便惊惶失措，最高决策者也缺乏应付西方列强的心理准备和政治智慧。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弱点充分暴露，威信大损。数千英兵蹂躏沿海各省，威

胁京津，深入长江。鸦片战争终于以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告终，割地、赔款、开商埠、片面最惠国条款、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丧权辱国已极。当时人惊呼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个英国人由此得出结论说：“富饶的清帝国宁愿任人宰割而不敢用武力抵抗。”

英法两国为了扩大鸦片战争中攫取的权益，看准了清政府不敢用武装抵抗的弱点，各自寻找借口，组成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攻入北京，洗劫、焚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到热河，清政府被迫答应了英法提出的一切要求。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此接踵而至，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更是一蹶不振。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倒给了东邻的日本一次深刻的教训，从此发愤图强。而在中国，执政当局依然苟且偷安，相信一纸条约会带来“万年和平”。少数知识分子中倒有忧心国是、放眼世界的人，如林则徐、魏源、梁廷相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则徐是当时清政府大员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鸦片战争一结束，便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要善于向一切有“长技”的“夷”学习。但《海国图志》在清皇朝统治下的中国并未受到重视，正如左宗棠所说“书成，魏子歿，廿余载，事局如故。”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东邻的日本。这个历来被人们瞧不起的

岛国，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短短的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后的小国一跃而成为雄霸东亚的强权，并参与西方列强对远东地区的殖民争夺。清政府真正感到震惊的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焚掠御苑，这才认识到“夷”确有“长技”可“师”，部分督抚和中央大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兴办洋务以求自强。

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个认识过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这个认识又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强邻环列，虎视鹰瞵

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识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各国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又开始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识的新的技术革命。电力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动力，并进入家庭生活。

发电机、电动机、远距离输电技术的发明，使炼钢、化学和其他工业部门，以及铁路和水上运输、邮电通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钢的质量提高，产量猛增。英、美、法、德四国的钢产量，1860 年（咸丰十年）仅 24 万吨，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增至 2 355 万吨，40 年间增加了 97 倍。

电力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加速了铁路和交通运输的变革，世界的铁路长度由 1870 年（同治九年）的 21 万公里增加到 1900 年的 79 万公里。化学工业的建立是 19 世纪末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又一重大突破。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兴旺，加速了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1870 年世

界石油产量只有 80 万吨，1900 年增至 2 000 万吨。电报、电话，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发明，把相距遥远的人们紧密地联结起来。

在英、美、法、德四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俄国和日本也急起直追，而中国则被西方发达国家更远地抛在后面。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更落后就更要挨打，中国已陷入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等特权，而是要求直接占领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独占市场和殖民地。

“师夷之长技”只着眼于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君主专制，官场上依然是腐败成风。积弊积弱的中国。并没有通过一场求富图强的自强运动真正的富强起来。几乎是同时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在迅速强大之后，于 1894 年（光绪二十年）发动了侵华战争，即甲午之战。中国按照西方坚船利炮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陆军也不堪一击。中国之败，与其说是败于军事，不如说是败于政治。战后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日本强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勒索战争赔款白银两万万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中日甲午战后不久，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狂潮出现了。这场狂潮是从俄、德、法三国借口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开始的。俄国是瓜分中国的急先锋，很快就夺得了在东北地区修筑和经营铁路的特权，并租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东、广西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了日

本的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彼此承认和互相开放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大家“利益均沾”，实际上是要其他国家都向美国开放自己的势力范围。

甲午之战促进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有识之士纷纷指出：洋务派那种枝枝节节的改革无补于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有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日本式的拥立皇帝进行变法。可是慈禧太后一个政变，光绪皇帝反倒做了瀛台的囚君，康梁成了亡命海外的游子，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一切仍由慈禧太后一人独揽权柄。

教士教民，倚仗帝国主义势力，欺压中国人民。民教冲突，由来已久，而且势同水火。特别是甲午战败后反帝爱国思想的昂扬，混杂着排外情绪的滋长，由广泛的反洋教运动发展起来的义和团，到处打击帝国主义，到处焚教堂、杀教士教民、拆铁路、毁电线，乃至仇恨一切洋事洋物。光绪二十六年，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个国家联合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八国联军蹂躏京津及华北，甚至东北，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勒索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年息四厘，再加上各省地方性赔款，约等于清政府 12 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西方列强中“瓜分”、“共管”的论调甚嚣尘上，正如兴中会宣言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接壤，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与康、梁的变法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不同，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则认为中国病根在君主专制，而清政府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于是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结束清入关以来 268 年的统治。

第一章

满族的崛起

(自先秦至崇德八年)

第一节 满族的先世

清代，是以满族在统治阶级中占支配地位的朝代。满族是女真的后裔，在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先民可以上溯到 3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的肃慎。

肃慎是中国东北的古老的族属，见诸先秦、两汉文献。自虞舜起，历夏、商、周，一直与中原有联系。是中原人对居住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两岸，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的古代居民的泛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獻中的肃慎，是一个族系的名称。在两汉三国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无非是说明这些古代的族的共同体都属于肃慎一系。

北宋末，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统一各部，于宋政和五年（1115 年）建立金。七年，与北宋联合灭辽。金天会五年（1127 年），推翻北宋政权。天德五年（1153 年）迁都燕京（今北京），辖境北至外兴安岭上的火鲁火曷谋克，东临海，西以“界壕”与蒙古为邻，南达淮河，与南宋并立。从此，大批汉

人迁徙东北地区，女真人则陆续迁居中原。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金被元所灭，入居中原的女真人，只有一小部分回到东北，大部分留在中原和汉族融合。没有入居中原留居东北的女真各部，元朝政府设立多层次的统治机构分而治之。

到了明代，女真被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类。（1）建州女真。因明招抚设置建州卫而得名，居住在今新宾县和今桓仁县一带。因其西毗连明辽东各卫所，南隔鸭绿江与朝鲜紧邻，受汉族和朝鲜族影响较大，发展很快，是明代女真各部中比较强大的部分，是后来建立金国的主体部分。（2）海西女真。居住在嫩江以东到倭肯河的松花江及其各支流的沿岸的许多部落，松花江在元明两代又称海西江，因而统称之为海西女真。（3）“野人”女真。明政府歧视少数民族，对女真人统称为“野人”。单列“野人”女真，不仅仅是因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比建州、海西更“野”，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在极为偏远的地区，故把这一部分女真称之为“野人”女真。

明代对女真采取招抚为主的政策。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对女真各部的招抚，为明统治整个东北，远到黑龙江下游入海地区奠定了基础。

明朝政府设立辽东、奴尔干（今黑龙江下游）等指挥使司及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管辖女真地区。明朝政府在女真各部设置的卫所都是羁縻卫所，和在各行省设置的卫所不同。羁縻卫所按部落设置，授予首领头人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衔，使“各自雄长，不相归一”，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其职位可以依照明朝政府的规定世袭，无年俸，卫所随部落的迁徙而迁徙，治所无常，无衙署，类似宗藩关系，在政治上必须向明朝中央政府朝贡，服从征调，是

中国历史上以往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制度的继续。

中国历史上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另一统治政策是朝贡贸易，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也采取这种政策。女真各部首领来京进贡，明政府则发给印信或敕书，授予官职。朝贡对女真各部首领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义务，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凡是得到明朝政府委任为卫所的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千百户、镇抚的，就是取得了明朝政府承认的对本部落的统治权。印信或敕书，就是统治权力的标志。印信或敕书的持有者既是部落首领，又是明朝的地方行政官员。明朝政府和历代政府一样，对朝贡者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凡来朝贡的女真各卫官员，都给予优厚的赏赐，并允许在京贸易。

为了适应军事和驿传对马匹的需要，明政府在辽东开设“马市”，用高价大量收购马匹。“马市”成为汉族与女真族以及女真各部之间商品交换场所。女真人上市的商品，主要有马匹、貂皮、各种兽皮、人参、东珠、松子、木耳、蘑菇、蜂蜜等，汉人上市的商品有耕牛、猪、羊、犬、粮食、盐、布匹、丝绸、衣服、水靴、陶瓷、铁锅、铁铤等等。

第二节 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的，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早年丧母，因生活所迫，投奔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作战勇猛，屢



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立战功。他的先祖中有许多人接受明朝的册封，担任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官职。他的祖父觉昌安（明人称之为叫场），父亲塔克世（明人称之为他失），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在觉昌安父子的时代，女真社会各部蜂起，互相攻战。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勾引明军镇压建州首领王果之子阿台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给明军带路而被误杀。

努尔哈赤承袭祖父职位为建州左卫的指挥使，成为建州女真的首领之一。他打着为祖父、父亲报仇的旗号，以“遗甲十三副”宣布起兵。尼堪外兰则凭借明廷的支持，收集阿台旧部，并且逼迫努尔哈赤归附。宁古塔穆昆中觉昌安兄弟 6 人的子孙，对努尔哈赤承袭其祖父觉昌安的职位不服，共同对神立誓，要谋害努尔哈赤，归附尼堪外兰。而萨尔浒城的诺米纳、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都归附努尔哈赤，结盟共谋进攻尼堪外兰。苏克素护部各城各寨在混战中重新组合。

努尔哈赤联合诺米纳、噶哈善、常书、杨书，兵力仍不

满百，披甲者只有 30，于万历十一年五月取图伦城，尼堪外兰逃往靠近抚顺关的嘉班城。努尔哈赤“克图伦”一事，史称“太祖起兵”，揭开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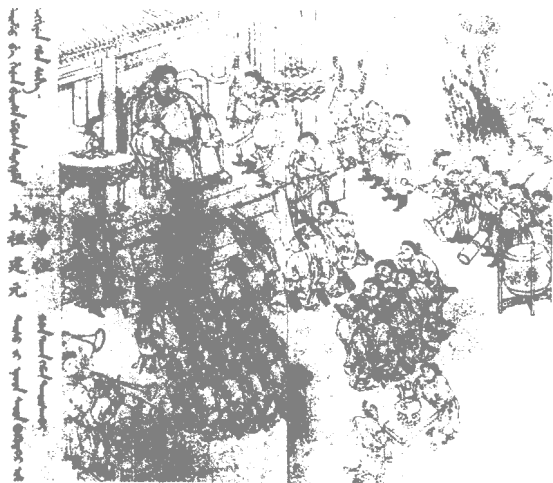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主要是在苏克素护部内同尼堪外兰的争夺，其他各部则因各自的利害，依违其间。尼堪外兰被消灭后，附近各部皆望风归附。万历十六年（1588年）克完颜城，消灭了完颜部，万历十七年攻克兆嘉城，完成了对建州各部的统一。明朝政府封努尔哈赤为都督僉事，建州女真内部称之为都督。

建州女真统一以后的形势，有利于努尔哈赤继续征服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叶赫等 9 部联军的进攻，趁势招抚珠舍里部，攻灭讷殷部。二十三年，被明晋封为龙虎将军。此后又陆续吞并其他各部女真，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吞并哈达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吞并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吞并乌拉部。努尔哈赤在消灭乌拉之后，一面厚结蒙古的喀尔喀部和科尔沁部，他本人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同蒙古联姻。同时派兵到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去收服黑龙江虎尔哈各部 and 东海各部，包括沿日本海岛屿散居的小部女真人。除叶赫部暂时对峙外，努尔哈赤统一了所有的女真各部。将其所属国人统统编入八旗，确立了八旗制度，满语称之为固山牛录。

八旗制度是根据女真族狩猎时采用的“牛录”组织形式加以改组扩大而建立的，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按规定，每 300 人为一牛录，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为一甲喇，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立一固山额真。初设黄、白、蓝、红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满洲八

旗。后金全部人丁，均编入八旗。平时狩猎，是生产单位；战时出征，是军事组织。军政费用及各种差、役，均摊派给八旗各牛录承担。由于战争的经常化，氏族成员中的男丁成为军卒，氏族的一切活动都服从征服战争的需要来编组和安排。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称汗，建立“大金”，年号“天命”。努尔哈赤之所以建国号为“金”，是因为他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作是历史上金朝（1115—1234年）之复兴和继续，史学界称之为“后金”。



努尔哈赤建元即位图

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月十三日，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明，揭开了明金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七

大恨”的内容主要是说，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被明军杀害；明朝政府对待女真各部不公平，偏袒叶赫，压制建州；明朝政府不守信义，不遵界约，侵占建州取得的哈达的土地。除了七大恨之外，还有数不清的许多小恨。这些大大小小的仇恨，是明政府对女真各部实行民族压迫的结果。誓师攻明，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一面，又有到汉族农业区掠掳人口、耕牛、粮食的落后性的一面。

誓师当天，努尔哈赤率领主力，乘隙攻入抚顺，守城官李永芳投降。另一路攻取附近的许多村落，都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后金攻明，首战告捷，从此改变了辽东的形势。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明政府以杨镐领兵进攻后金，结果大败于萨尔浒（今新宾县西），史称萨尔浒大战。后金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这对明金关系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在这以前，女真是明朝的“属夷”。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才对明朝亮出金国的牌子。后金称明政府为“南朝”，自称金国，铸“天命金国汗印”，不再使用“建州左卫之印”。萨尔浒大战胜利后，努尔哈赤乘胜利余威，攻陷开原、铁岭，吞并叶赫，完成女真的真正统一。

第三节 努尔哈赤时期辽东的军事和政治

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相继攻占沈阳、辽阳等70余城。金军攻下沈阳、辽阳以后，不像过去那样毁城撤兵退回老家，而是把老家迁徙到新占领区。努尔哈赤决

定把都城迁至辽阳。以后又迁至沈阳，改名盛京。



沈阳故宫大政殿

在封建租佃关系已经相当发达、文化水平远远高出女真人的汉人农耕社会的土地上，用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怎样安顿女真人，又怎样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呢？这些都是摆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金国统治集团面前的新课题。

过去金军对凡是抵抗者，在攻陷之后，男丁一律屠杀，掳掠妻小分给八旗军户为奴。攻取抚顺之后，开始改变。下辽沈以后，已经认识到要在辽东建立统治，不杀汉人对自己是有利的，能够“增加国人，增加兵，增加钱粮”。适应发展的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屠杀抗拒者的积习，是努尔哈赤在认识上和政策上一大进步。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为了在辽东建立巩固的统